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风雨兼程

——新中国辉煌60年丛书

主编 黄修荣

第四卷

辉煌崛起

黄黎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风雨兼程

——新中国辉煌60年丛书

主编 黄修荣

第四卷

辉煌崛起

黄黎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 春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辉煌崛起/黄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风雨兼程——新中国
辉煌 60 年丛书 黄修荣主编)

ISBN 978-7-01-008288-2

I. 辉… II. ①黄… ②黄… III.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
IV.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897 号

辉 煌 崛 起

HUIHUANG JUEQI

黄 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9.625

字数:473 千字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978-7-01-008288-2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交接	/1
一、改革开放面临“过大关”	/1
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担当重任	/9
三、冲击思想的“困围”	/24
第二章 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	/34
一、南方谈话及其影响	/34
二、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浪潮	/53
三、党的十四大召开及三大决策	/68
第三章 改革开放大潮再起	/98
一、住房制度改革及“房地产热”的形成	/98
二、股份制改革与“股市潮”	/112
三、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	/125
第四章 与市场经济接轨	/136
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新起点	/136
二、推进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	/146
三、劳动制度改革迈开新步伐	/154
第五章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168
一、粗放型增长暴露出弊端	/168

- 二、宏观调控机制的运用 /176
- 三、建构新的财税体制 /187
- 四、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改革 /199
- 五、宏观经济“软着陆”成功 /207

第六章 跨世纪的发展战略构想 /217

- 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217
- 二、精神文明建设跨世纪的纲领 /229
- 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部署 /240

第七章 把什么样的中国带入新世纪 /250

- 一、世纪末的路向选择 /250
- 二、党的十五大：举旗、定位的盛会 /257
- 三、沉着应对国内外风险的挑战 /271
- 四、扩大内需，再造新的经济活力 /292

第八章 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301

- 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301
- 二、混合所有制结构新格局 /317
- 三、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与实施西部大开发 /325
- 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步伐 /338

第九章 推进和深化配套改革 /348

- 一、治本之策：深化金融改革 /348
- 二、证券市场的发展和规范 /357
- 三、建立城镇住房新制度 /364
- 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73

第十章 “走出去”战略与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384

- 一、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384
- 二、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398
- 三、加入世贸组织的艰难历程 /403
- 四、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 /411

第十一章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416

- 一、启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工程 /416
- 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 /430
- 三、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444

第十二章 依法治国与政治体制改革 /457

- 一、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457
- 二、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 /477
- 三、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489

第十三章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502

- 一、香港回归祖国 /502
- 二、世纪之交,澳门归来 /521
- 三、努力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 /526

第十四章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539

- 一、面向新世纪推进执政党的建设 /539
- 二、开展“三讲”教育,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素质 /544
- 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548
- 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553

五、开创党的组织建设新局面 /564

第十五章 在新世纪发展的道路上 /576

一、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576

二、走科学发展之路 /593

三、再创“中国奇迹” /607

第一章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 政治交接

一、改革开放面临“过大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时期的历史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探索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基本的实践,是通过改革来加快发展,在探索中不断地前进。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我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1988年以后,由于经济运行中许多深层次矛盾突出地显露出来,包括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及西方国家随之实行“经济制裁”的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缓,增长幅度明显下降。198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1987年增长11.1%,1989年仅增长4.1%,1990年又降至3.9%。发展速度缓慢,不仅给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造成多方面的压力,而且使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难以有突破性的解决。这些情况表明,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中的问题使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历史转折关头。

中国经济由快速发展转为放慢减缓,其中包含着一个需要慎重对待和妥善处理的问题,即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以改革不断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从而推进新的更大发展。1984—1988年,我国在坚持改革、推进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这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21.7%;GDP从7171亿元上

升到 14928 亿元,实现了翻一番,年均增长 12.08%,国家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这种快速发展,为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在发展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趋于尖锐,这些矛盾又成为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第一,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形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84 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过热状态,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消费基金过度增长,连续 4 年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供需差率在 1983 年为 4.7%,1987 年扩大到 13.6%。为了供应不断膨胀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每年货币量的增长都高于经济的增长。1987 年年底,我国的货币流通量达 1454 亿元,比 1983 年增加 174%。货币量的高增长,必然带动物价普遍上涨。1987 年在没有大的改革措施出台的情况下,全国商品零售价总水平仍比 1986 年平均上升 7.3%;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比 1986 年上升 8.8%,有些大城市的上升幅度已突破 10%。

第二,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又开始凸显出来,农业重新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1984 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 1983 年增长 14%,农业总产值增长 14.5%,农业增长速度还高于工业;1986 年、1987 年,我国工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工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11.1% 和 16.5%;而农业增长速度则大幅度跌落,分别只有 3.5% 和 4.7%,其中粮食仅增长 2.8%。加上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又回升到 14‰ 以上,仅 1987 年就净增人口 1500 多万,人均粮食由 1984 年的 395.5 公斤下降到 376 公斤,下降了 5%,我国的粮食由改革开放以后的净出口再次转为净进口。

第三,经济秩序紊乱,国家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减弱。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失控,在生产、建设、流通领域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现象。特别是在流通

领域,混乱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其突出表现是各种公司办得过多、过滥,远远超过了正常商品流通的需要。一些“官倒”公司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在流通领域转手倒卖重要生产资料,牟取暴利。这种非正常的商业行为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上述诸方面的矛盾,当时被称为“四过一乱”,即过旺的社会需求、过快的工业发展速度、过多的信贷和货币投放、过高的物价涨幅以及经济秩序混乱。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与经济增长过热有关,但更深刻的原因是由于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改革措施不配套和一些管理工作没有跟上造成的。改革和发展初步地显示了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商品经济的能量和魔力,同时又不断地暴露出新旧两种体制和两种运行机制的矛盾、摩擦和冲突。经济生活中的客观力量要求加大改革力度,加快由双轨制向单轨制过渡,这种认识在1988年年初形成主导意见。其中,关注的焦点是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

根据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定的方针,1988年全党的工作以加快和深化改革为中心议题。对于经济形势的看法,2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3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都认为,这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是比较正常、健康的,不稳定因素正在趋于缓解。因此,虽然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1988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稳定经济,深化改革,以改革总揽全局”,注意了“稳定经济”这一条,但在实际部署上则倾向于加快改革步伐。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经济增长和稳定,都是必需的。经济不稳定,无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安定;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许多矛盾会更尖锐。”从中央的指导方针看,就是“不能只注意稳住物价一头,而必须兼顾物价与发展两个方面”。在这种认识下,“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实际上难以

两全。从经济工作的进展来看：一是从1988年年初开始，又放松了对财政信贷的控制，本来在1987年第四季度初步得到控制的需求，又重新开始膨胀起来；二是在1988年的上半年，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改革闯关。

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物价历来由国家规定。其中尤其是粮食及各种副食品，收购价长期定得很低。改革开放后虽然提高了几次，总水平还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又不能提高，导致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上了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不可能更多地投入经济建设，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就更少了。因此，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一点在中央领导层基本达成共识。

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对价格改革的意义作了说明。他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这是邓小平在公开场合第一次将价格改革称为“闯关”。

此后，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多次强调价格改革的必要性。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时又指出：我们现在还要过几个险关，主要的一个关是要理顺物价。过去物价都是靠国家补贴过日子。现在我们开始过第一个关。这一个关过了，还要过其他的关，这就是最大的风险。针对那种想要绕过价格改革的主张，他说，物价这个关不过不行，是绕不过去的。如果在20世纪剩下的十多年之内，不把物价理顺，在

21 世纪要达到目标就很困难。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强调了价格改革问题,认为价格不合理是实行市场经济的一个很大障碍。这些谈话表明,对于推进价格改革的必要性,中央领导层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局、商业部决定从 1988 年 4 月 1 日起,调整部分粮、油的收购价格。4 月 5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主要副食品(肉、蛋、菜、糖)的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从 5 月以后,彩色电视机实行浮动价格,国产的一般机型上浮 20%—30%;经国务院批准,从 7 月 28 日起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同时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等等。

随着一些生活日用品价格的放开,制定价格改革的系统方案也被提上了日程。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提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有通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既要理顺关系、促进生产,又要使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会议决定制定价格、工资制度改革的系统方案。会后,中央责成专门机构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此后 5 年特别是 1989 年的价格、工资制度改革和配套措施问题。经过几上几下的论证,有关部门提出了关于价格、工资制度改革的初步方案。8 月 5—9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对初步方案进行了讨论,最后形成准备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方案,内容包括:价格、工资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改革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1989—1993 年改革的轮廓设想,1989 年改革的初步方案,改革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和基本对策,必须采取的配套改革措施等。

8 月 15—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会议将价

格改革的总的方向确定为:少数重点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此后5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的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

价格改革方案的通过,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大的一场抢购风潮的导火索,这是中央在决策过程中始料未及的。本来,在1988年年初,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重新开始膨胀起来,物价涨幅已经很大,再加上一些大的价格改革措施集中出台,到7月份,物价上涨幅度已达19.3%,创下历史的最高纪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社会各界群众已经产生通货膨胀预期。本来,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初步理顺价格关系,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价格改革方案的消息一经传开,人们误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涨价即将开始,于是,继4、5月份的抢购风潮之后,在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股更为凶猛的抢购风潮。这场抢购风潮,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波及面广。从8月中旬开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福州、成都等大城市再次突起抢购风潮,并很快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

第二,抢购品种全。这次抢购的主要对象为穿、用商品,涉及50个大类500多种,也有部分地区抢购粮食、食油的。可以说,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小到消耗量很大的日常生活用品,均在抢购

之列。

第三,盲目性大。在这次抢购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经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保值,所以购物时不管品种、不论品牌、不问质量、不讲价格,很多商场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在这次风潮中被一抢而空。

第四,卷入阶层多。面对1988年年初以来物价持续大幅度的上涨,各阶层群众普遍产生购物保值的心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卷入到盲目的抢购中去。这次风潮中的抢购者,有工人、教师、机关干部、科技工作者、个体工商业者、农民等,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而以有固定工资收入者居多。

第五,零售商品总额增幅高。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36.2亿元,比1987年同期增加38.6%,如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约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绸缎增销35.5%,洗衣机增销130%,电冰箱增销82.8%,电视机增销56%。

第六,商品抢购风潮伴随挤兑银行储蓄存款风潮。这次抢购风潮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是动用储蓄存款,不仅挤兑活期存款,而且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从而导致储蓄存款大滑坡的严重局面。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储蓄减少27.8亿元,活期储蓄增加1.7亿元。

这些情况,反映了老百姓普遍存在对物价上涨的恐惧和持币抢购的心理状态,对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承受力不足。由此导致的抢购风潮,成为这次价格改革闯关难以逾越的障碍。面对价格改革的强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调整对策。8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次常务会议,会议重提“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申明:价格改革方案中提到的“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经过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长远目

标。在这里,原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提出的“五年左右的时间”,已修订为“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这次会议还作出保证:“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明年作为实现五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这次会议,为这次价格改革闯关画上了句号。

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受挫,致使此前遇到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具体表现为:第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第二,在供求总量不平衡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第三,物价涨幅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第四,伴随几次抢购风潮,经济秩序愈加混乱。总的来看,在价格改革闯关受挫之后,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些矛盾如果不认真加以解决,其发展后果势必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

针对各种矛盾趋于尖锐的情况,中央开始考虑如何加以治理的问题。198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9月26—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这个指导方针和相关政策、措施。全会确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年和1990年两年的改革和建设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明显变化。过旺的社会需求初步得到控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明显回落,过热的市场开始降温。1989年1—9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季缩减;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到8.9%;国家信贷比1988年同期少发放377亿元贷款;物价指数逐月回落,由2月的27.9%降为9月的11.4%。

这一阶段的治理整顿,使国民经济运行有所好转,但总的看,

难关仍未渡过。一是供求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仍未根本解决；二是市场商品销售疲软，工业生产出现滑坡；三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不仅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而且严重干扰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工作的进展，加重了经济困难。

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担当重任

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被平息之后，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同时，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他反复强调：“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他明确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旦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他还着重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因为有毛泽东做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没有把共产党打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际上是邓小平处在领导核心地位，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没有影响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密筹划和有力推动下，1989年6月23—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之后，邓小平再一次提出退休问题。9月4日，他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表示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邓小平恳切地希望中央批准他的请求。

11月6—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辞职请求，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并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0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同时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在这次换届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至此，中国顺利地完成了党、国家、军队最高领导的新老交替，实现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班和接班。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着严峻的考验。当时，中国的政治风波还有许多遗留问题亟待处理，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急剧的演变和动荡，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尤其是中国平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经济制裁”为武器，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加了许多困难。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是不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